

厦 門 工 商 集 萃

(增 補)

厦门市工商联会史

一、概 况

厦门市工商联会史，追溯历史记载，正式商会组织始自前清光绪三十年。清康熙年间，靖海将军施琅和巡抚高世倬，先后建议清庭批准开放对外贸易。随着对外贸易发展，做贩洋生意的商行相继设立。因此，成立了“行商会馆”。行商会馆，也就是当时对外贸易行业的公会组织。会址设在本市和凤宫边（现在第二印刷厂车间）。

清光绪三十年，当时海运频通，清政府曾一度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稍知重视商业，于京都设置商部，专司全国商政，令各都邑设置商会，厦门商会于是时创立，其制度和名称几经变更。在光绪、宣统年间，名为“商务总会”，民国五年改称“总商会”，厦岛光复后，称“市商会”，解放后，改称“工商业联合会”。会中负责人名称几经变易。清时代，综理会务者称为总理、副之称协理。民国后改称会长、副会长。北伐时代，会长又改称主席。解放前改称为理事长，常务委员。解放后易名为主委、副主委。后又改称会长。办公地点屡经迁徙。前清时，赁镇邦路楼屋为会所，民国后乃将常关旧址募资建筑，民国十八年会所因开辟中山路路面被拆掉，当时假糖油公会会所为办公地点，后以变卖会所公款，购筑新会所于海后滩。解放后，一九六七年底（文革期间），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会址被占用，恢复活动后在民主大厦五楼办公，至一九八四年一月迁回现址。

前清光绪末，厦门为五口通商之一，故遵制设总会，当时部议以在籍侍郎衔太仆寺卿林维源任总理，内部决定，命令未下时，而林维源病逝，后乃以其家嗣五品京堂林尔嘉为总理，以进仕三品卿衔陈刚任协理，会中设议董四人，议员二十四人。皆以

并延聘进士内阁中书施士法为坐办，常务悉归处理。辛亥光复，厦门商务总会改称总商会，采用会长制，洪鸿儒先生前后膺任七届，时间最长。

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廿五日召开复原改组会员大会，成立市商会，选严焰为理事长，庄金章、骆萍踪为常务理事。解放后，蔡衍吉先生被选为市工商联主委，任职期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如当时购买爱国公债，由于他积极做好动员工作，工商界认购公债二十万分，为全省之冠。抗美援朝时，他也发动全市工商界踊跃捐机献炮，超额完成捐献任务。党曾授给蔡衍吉同志以全国工商界模范工作者的荣誉称呼，于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二、历届大事记

1. 联争请准维持商会组织：民国十七年间，全国曾一度兴起反对商会，认为商会是土豪劣绅买办阶级机构，贸然请求取消，本会乃与全国各总商会，电呈政府当局请准继续维持，结果获得批准，颁布商会法，并取消商民协会，因此，商人团体之组织的商会得以存在。

2. 提倡国货，反对洋货：当时关税不自主，厘金未裁撤，外货源源输入，洋货充斥市场，国货遭受严重打击，为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本会除函请全国商会联合会通告各地商会，一致倡用国布国烟国语外，并通知本市各业公会转知全体会员，一律倡用国布，凡公私宴会，一律吸饮国烟、国酒。

3. 抗争常关征收内地税：厦门进口货物，转运内地，素由常关验单批明放行。民国十九年四月厦门常关税务司，呈准自是年六月一日起征收内地复出口税。本会为维护商人正当权益乃召集各业公会代表讨论，决定由各业公会组织「厦门各业公会反对常关征收内地复出口税委员会」，并电财政部收回成命，并通

知全市商人自十月一日起，一律罢运，停止进出口货物运输，静候解决。嗣由财政部电令厦门常关监督，对常关内地税应会同商会及各业公会代表商妥解决，在未解决前，暂缓征收，商人始照常配运。

4. 抗争各种苛捐什税：民国十七、十八、十九年间，本市各种税捐如麻，强加在商人身上，形成一物数税，且更甚者由私人承包捐税，从中渔利。当时所增设之税有：火柴税、土货内地税、特种消费税、印花税、豆饼捐、竹木税、茶务捐、糖类税、肥粉重征抵补税、海味税（由私人包办）、五金特税等等，均经本会据理向有关当局力争，直至完满结果而后止，为本市商人排除困难，从而繁荣市场。

5. 赞助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辛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本会由洪鸿儒会长邀集本市绅商学各界，共商厦门独立事宜。时驻厦兴泉永兵备道庆潘、厦防分府王子凤，因见时势不可挡，相继弃职而逃，是时地方无主，即由各界宣告本市独立，组织自治会，维持地方治安，公推洪鸿儒、黄鸿翔为会长，迨至光复时，地方秩序井然，当时地方维持费用，需款浩繁，均由本会设法筹措。民国十五年，党军入闽，总指挥何应钦派财政部处长双清，李基鸿两人到厦筹募北伐经费，由本会筹借二十万元接济，以后派专员许卓然，陈亮两人到会借北伐费三十万元，本会即筹借以应之。又募献草鞋费，以应北伐军需。

6. 收回海后滩斗争：时在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准许英人在厦门港水操台、南较场两处，居住眷属，（该地曾经英军占领）作为租地，后以英商因距离码头较远，未便经营，由英领事要求由岛美路头至新路止，准予租给，时为咸丰元年。以后，光绪三年，英商和记行，擅筑海滩。光绪四年英商水陆行又在该行面前擅筑海滩。迨至民国七年九月，漳泉兵警，英领藉词防卫，令陆战队登陆，又在海后后面一律围筑

砖墙，横断原来之官道，安设铁门，并悬挂大英租界地，闲人不许乱进等字样界牌，又复竖杆升旗。本会与教育会以及厦门市人民一致起而抗争。此事虽经全市力争收回海后滩主权，因英方狡赖，一再拖延，至民国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由外交部电嘱厦门道尹陈培琨及交涉员刘光谦与英领事在厦谈判，此事乃平息。

7. 抵制丧权辱国的廿一条件斗争：自廿一条件签订后，举国激愤，本市人民对此深为痛恨，本会曾会同教育会联络各界，召开厦门市民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抵制日货。

8. 支援五卅惨案斗争：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市民愤慨，本会联络各界领袖，组织厦门市国民对日外交后援会，开展工作，为政府外交之后援。

9. “七七”抗日战争：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本会联合各界组织厦门抗敌会，为本市抗敌先锋，由本会会长洪鸿儒及本会诸骨干人员参加该组织，积极动员贡献力量，支持抗日战争。直至厦门沦陷，诸同人均逃往南洋或内地。

10. 呼吁海外侨胞捐助粮食以济米荒：本市粮食一向仰给内地及南洋。沦陷期间，交通断绝，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抗战胜利后，粮食仍然恐慌，本会为了解决米荒，即分电香港、暹罗、安南等地华侨团体急速捐助粮食，以济燃眉之急，并电请中央救济总署及省粮食储运处拨发救济粮，以济民食。粮食恐慌，得以缓解。

11. 认购爱国公债及捐献飞机大炮：解放初期，国家发放爱国公债，本会积极响应号召，动员会员踊跃认购，工商界认购公债二十万分，超额完成任务，为全省之冠。抗美援朝时，全国掀起“献机献炮”运动，本会不甘落后，带动全市工商界捐献，超额完成任务，受到表扬。

三、历届领导人、时间：

届别	职别	姓名	时 间
第 一 届	总 理	林尔嘉	清光绪三十年一三十三年
	协 理	傅 政	
	协 理	邱振祥	
第 二 届	总 理	洪鸿儒	清光绪三十四一宣统三年
	协 理	陈剑门	
第 三 届	总 理	叶崇华	民国元年一民国三年
	协 理	黄庆元	
第 四 届	总 理	黄庆元	民国四年一民国六年
	协 理	叶孚光	
第 五 届	正 会 长	黄庆元	民国七年一民国九年
	副 会 长	叶孚光	
第 六 届	正 会 长	洪鸿儒	民国十年一民国十二年
	副 会 长	陈茂甫	(未几陈病故补选陈庆餘)
第 七 届	正 会 长	洪鸿儒	民国十三年一民国十四年
	副 会 长	蔡秋涛	
第 八 届	正 会 长	黄奕住	民国十五年一民国十六年
	副 会 长	洪鸿儒	
第 九 届	主 席	洪鸿儒	民国十七年一民国廿年
	主 席	陈瑞清	
	主 席	黄奕住	
第 十 届	主 席	洪鸿儒	民国廿一年一民国廿四年
第 十 一 届	主 席	洪鸿儒	民国廿五年一民国廿七年
第 十 二 届	理 事 长	严 焰	民国卅五年一民国卅九年
	常 务 理 事	庄金章	

常务理事 骆萍踪

解放后

第一届	主 委	蔡衍吉
第二届	主 委	蔡衍吉
第三届	主 委	丁乃扬
第四届	主 委	黄长溪
第五届	主 委	邵 庚
第六届	会 长	邵 庚

赖厝埕好清香

40年代初，“好清香”以其“烧肉粽”制作好、味道清香而得名，驰誉海内外。

“好清香”店址原来在厦门第一条马路“开元路”和最早的闹市“大同路”之间的“赖厝埕”。即使以后路名改为“大元路”，但老厦门人、老华侨，一提起老字号“好清香”，还连上老路名“赖厝埕”一起称呼。

半个世纪来，“好清香”从饮食店而至酒楼，从卖烧肉粽到卖鱼丸汤，从经营厦门传统名点小吃到开办闽南独具风味、别树一帜的“小吃宴”，生意越做越大，现在的经营品种除了芋包，五香、油葱粿、韭菜盒、炸春饼、贡糖夹饼等厦门传统名点外，还增加地方风味的咸芋枣、卤生肠、鱿鱼丝等。不久前推出的用仿古九龙磁碟拼成的九色正宗小吃，深受消费者喜爱。好清香酒楼还根据不同消费者需求，揉和闽粤菜系、闽台食俗，还推出“蜆粥”、“乌鸡响螺”、“芋泥海参金鸡爪”等佳肴。名厨名菜，相得益彰。

在今年春浓季节，好清香酒楼厨师还应邀前往新加坡献艺。

· 杨纪波 ·

心香一瓣献故人

缅怀蔡主委衍吉先生

蔡老先生是厦门市首届副市长、“两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首届主任委员。1957年春“反右”扩大化时被“错划”，“罢官”居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纠正、恢复政治荣誉，1980年2月11日下午被邀请参加市委、市政府召开的迎春座谈会之后，同与会的陆自奋书记、吴星峰市长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到南普陀寺时，猝然倒在会议厅上。来势凶猛的心肌梗塞症使在场的众名医回天乏术。工作到最后一息，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有二。流光如矢，蔡老离开我们转瞬10周年。他虽然作古，留下的精神、风范、音容笑貌、却难以磨灭。

蔡老建国前后特别是解放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表现、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赞赏。受到我市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钦佩、尊崇。前后被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侨联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省民建工委会常委，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厦门市委员会主任、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市劝购同盟胜利公债委员会工商分会主任、省华侨投资公司厦门募股委员会主任等等多项职务。曾荣获全国工商界模范工作者称号（本省两人）。被邀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1952年——1953年先后两次列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期间、陈毅、何香凝特邀蔡老单独谈话。他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市政协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1953年选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是菲律宾的爱国华侨、我省我市著名人士。

我认识他是在解放以后，斯时，我是市工商联执委，一个基层同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与他接触机会比较多。蔡老平易近人、谦和敦厚、谈吐豪爽、记忆非凡、语言简洁真实、给人以才学丰

博、坦率耿直、实实在在的 impression。“反右派”“文革”浩劫、直至“平反改正”、由于遭遇相同、二十多个寒暑中、我同他过从较密、对蔡老有进一步的了解。现将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些往事、以十分诚挚的心情，写下这篇拙文、作为心香一瓣，缅怀故人。

蔡老为人坦诚热忱、当仁不让、深有正义感，是一位有敏锐眼光和卓识远见人士。他从历史上国共两党对待国家民族兴亡的不同立场、思想上坚信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挽救中国的政党。早在解放前、他就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残酷压榨表示愤慨不满。在“窝匪同罪”的白色恐怖时期，他就支持进步。1945年蔡老在本市洪本部开办“中和岷栈”时，解放后任我市市委统战部部长施耀同志就在该栈以服务员身份为客人送饭端菜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活动。1947年夏在当时政府召开的所谓“各民众团体代表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公开反对征兵征粮，1948年东北解放，华北震动，国民党设在青岛的海军学校迁厦，国民党海军要塞司令滕云要把该校学员伙食费用转嫁于我市工商界身上，蔡老不顾当时反动势力的猖獗、横眉冷对、挺身而出，代表绸布公会，坚决提出反对。因此，触怒了滕云、滕决下毒手以“妨害公务罪”法办。蔡老翌日只得出逃菲律宾避难。

厦门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到处搜捕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其时，适有五位“菲五华共”地下工作同志被遣送回厦、被监禁听候军法处理，生命危在旦夕，蔡老获悉后设法担保释放出狱。其中陈永田先生出狱时身无分文，蔡老随之资助其逃往晋江深沪。事被驻菲国民党支部书记长柯俊智得知，柯即电市长李怡星转特务头子毛森，说“五华共是蔡行贿保释，要毛将蔡逮捕追究。毛森以“放走共犯”“包庇匪党”可以置人死地的罪状下逮捕令，准备晚上下手。蔡老得警察局朋友黄某密告后连夜逃亡。直至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进城才回家，前后四十三天。

蔡老是我市解放初第一位站出来与中共合作共事的工商界人

士。厦门解放仅半月他即受中共市委书记林一心委托重建市商会。接管后蔡老花一个左右月时间在旧商会伏案编写属下76个基层同业委员会（小组）以及成立鼓浪屿、灌口、禾山三个分会结构名单。某日下午，他去向林书记汇报工作。林说巧逢省财政厅长来市，留蔡少待共进晚餐。端出的是白稀粥和咸花生米一碟。这事让他感奋不已、彻夜难眠，对他夫人侯毓秀女士说：“国民党官员曾请他吃饭、山珍海味，一掷千金。如今只花几角钱。共产党有这样好的党风和干部，使他五体投地、尊崇敬佩。预见党的事业一定成功、社会主义必然兴旺”。历史已经证明他当时判断的正确。虽是小事一桩，对他却似“火上加油”、信念更加坚定。不顾其所持菲国护照限期将届、坚决放弃重返菲岛打算，“愿为党的事业奋斗，为建设家乡、建设厦门竭尽棉薄之力”（蔡老语）。及后，能够在面对特务恐吓，无所畏惧、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早在解放军进城之前、他就曾接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油印传单，深信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1949年10月17日五星红旗飘扬厦岛，翌早蔡老所经营的紫罗兰绸布商场全市第一家开门营业。在他带动下，工厂商店纷纷开门开工。为稳定人心，保障供给起启动作用。劝购同盟胜利公债是我市接受上级首项任务。当时的梁灵光市长与蔡老磋商工商分会的指标后（全市20万份，蔡老主动提出承担16万份、嗣因全省没有完成，让我市增加四万、蔡老充分估计工商业者高涨的爱国热情，又代表工商分会将此四万份承担下来。最后完成20万份以上，全省是厦门完成最好）。

那时，蔡老已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连续收到特务恐吓信三次。信上画刀画枪、威胁他应立即停止活动，否则，要他的命！蔡老一笑置之。说：“既然受党重任，怎可怕死当逃兵？”。毫不动摇。中共市委为策安全，派便衣人员，暗中保护。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内恢复经济、对外反帝封锁，任务

非常艰巨。蔡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团结和发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学习“共同纲领”、爱国守法生产经营；开展反封锁斗争；促进海外贸易联谊；遵章缴纳税收；协调劳资关系；在抗美援朝中大力发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捐机献炮（当年我市工商业界共献战斗机四架，超献高射炮一架，受到北京新华社和省政府表扬）；在宣传和贯彻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推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做出显著的贡献。

他没有架子，善于领导。他说：“做好工作要坚持三个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自己。他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发动群众，密切机关工作人员和各个基层行业骨干以及广大工商业者的联系、支持。善于把党的政策、领导班子和群众拧成一股绳，化成力量，加上他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因此，机关和基层都有一股生机蓬勃，闻风而动，一呼即应的劲头，得心应手地较好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事事带头。1956年1月，全市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蔡老经营的紫罗兰绸布商场全市第一个盖章，首先拥护，并带领工商界代表人物，敲锣打鼓向省府、市府报喜。蔡夫人侯毓秀女士不但发动工商家属帮助亲人接受改造，还参加纱布行业清产核资具体工作去发现问题，及时总结推广，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

蔡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但关心我们工商业者的进步，还特别重视工商业家在生产和经营上的技术才能，把我们的技术经验和业务知识当作国家财富来看待。他勉励我们：“要做个合格的民族工商业者，将有用的知识经验积极地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服务、为子孙造福”。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他胸怀豁达，虔诚耿直、与党真诚相处。他在市民建会上多次强调：“我们既要中国共产党的政友、更要当好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他表里如一、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总是坦率地

提出批评建议。例如：早在“三大”改造时，“一刀切”地把“三小”（小业主、小商、小贩）甚至夜间沿街叫卖的“扁食担”（云吞小吃）也统统合掉。他就强烈提出异议。说：“小商小贩，担葱卖菜，串街走巷，便利群众，不要合作”。57年党开门整风期间，一提再提，认为这样下去，必将造成群众生活不方便，造成小商品短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呼声有先见之明。蔡老既敢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不怕得罪，也敢于满腔热情地为维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仗义执言。这耿直风格至今仍为老一辈工商业者所津津乐道，深刻难忘。他说：“只顾自己乌纱帽、唯唯诺诺，不向党说真心话，反映真实，其结果，只有拉开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误国害民，给党帮倒忙”。1957年党开门整风，他要求“两会”成员特别是骨干分子投入运动，帮助领导党去掉“三风”“五气”。他说：“我们是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代表人物，理应起积极带头作用，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才是真正爱护党。要大家相信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是这样。为此，他吃了不少极左路线的苦头，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依然不改初衷、坚信党的政策。就是在他被“错划右派”之后，遭受种种不公正对待，也从无怨言。认为这绝对不是党的政策。对党的爱戴和信赖依然如旧。粉碎“四人帮”以后，蔡老虽年过花甲、身躯欠安，仍然坚持学习、追求进步、关心国家大事。经过拨乱反正，党和政府为之平反改正以后，蔡老精神十分感奋，对前景充满乐观。有一次，我和林子敏同志去看望他。蔡老非常高兴地说：“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传统终于盼回来了。经历过严峻的冬天，更加感受到春光的温暖。年华虚度、个人损失、国家也受损失。但为时未晚，趁身体还好的时候，多做一些工作以弥补丢失的岁月。”接着他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听党的话“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千万别放在心上。这样才能做好工作和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些

豁达大度的话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启发和教导；也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其时，蔡老虽还未正式宣布担任任何职务，但他已经默默地为党和人民的工作而“运转”不息。每天除接待来自北京、外省、我市各方面人士访谈之外，稍空就思考问题、奋笔疾书。对我市各个方面工作，如：争取侨汇；争取外资；中外合建商品房（外方出资金，我方出地皮）以缓解住房紧张；开放小商小贩买卖；允许小业主（夫妻店、小作坊）个体户生产经营；恢复名、优、特传统手工业产品工艺品出口创汇；市场合理布局和商店专业化经营；特别是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和商品流通体制以及如何提高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效率等等都提出许多切实中肯的建议。有的已被采纳实施。蔡老对当时已经露现的社会上和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以及某些腐败现象也坦诚提出批评。凡此种种，都说明他与党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友、诤友。也充分说明他“老牛自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可贵精神、品格。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蔡老离开我们已经10个年头了。与他在世时相比，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商会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才华的新一代在不断涌现。在纪念市总商会四十周年会庆之际，写了以上一些回忆，一方面表示对解放后接管旧商会、筹办工商联、成立后为之操心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蔡主委衍吉先生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当年与蔡老合作共事“辅助朝纲”的林采之、丁乃扬两位副主委的怀念和去年逝世的郭永义副会长的怀念、以期我们追踪前人，有所启迪；另一方面虔祝市总商会在中共的领导、关怀、指引下，全体新老会员紧密团结、精诚合作下，有新的发展、更大的作为。我们坚信：它必将为建设厦门经济特区谱写新的篇章。

罗思礼 1990年10月初稿 1990年11月20日定稿¹

林采之传略

(林水整理) 1989年11月

爱国民主人士林采之原名辟欣字健农。1897年生于福建省龙岩县石桥头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童年得到伯父的帮助就读于龙岩九中与邓子恢同窗校友。他爱好书法、绘画，并有一定造诣，善绘兰花、喜爱钓鱼。毕业后在龙岩“西山”“明德”等小学任教员和校长，历时九年。他年青时曾被军阀败兵抓去当挑夫，备受凌辱。途中乘机逃跑，始获生返。1926年得到他表兄郭荣圻的帮助南渡苏门答腊已东，在福建同乡所办的新华小学任校长。1928年弃教从商，到巨港创办“南田”镜画店兼营广告业务。由于他能书能画，成品有特色、业务发达，颇有积蓄。后来又组办恒丰什货店。由他的学生原全国侨联付主席王源兴主持店务，生意很好。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事业。他在南洋与诸侨领关系密切。参加陈嘉庚先生发起的“筹赈会”为巨港地区代表，积极为“筹赈会”筹募款项。1939年携眷回国，闲居上海四年。于1943年回到故乡龙岩，安置好家庭。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渡南洋巨港。办理结束“南田”店务。1946年为振兴中华组办民族工业回国。同年与同乡章祖镛等在厦门组办铅锰粉厂。该厂1947年扩大，增加生产干电池，厂名建福电池厂，他任厂长。热爱社会主义、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厦门解放后，1949年12月1日与工业界黄重生等发起组织工业联合会，被推选为主任。1950年3月21日厦门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工业联与工商联合并，蔡衍吉为主任，林采之等为付主任。同年2月20日成立厦门市推动复工委员会。付市长张维兹为主任，林采之为付主任。解放初期工商业者对生产经营尚有一定顾虑，在他的协助推动下消除疑虑振兴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1950年8月4日厦门归国华侨联合会

成立，他被选为主席。1953年参加福建省民主建国会、与蔡衍吉一起在厦门发展民建组织。热心教育事业受到教育界的尊重。他曾任厦门华侨中学校长。1951年任思明区文化补习学校校长，后来改名厦门市第六中学，任名誉校长。还担任鹭潮美术学校董事长等职，积极帮助“六中”“大同”“双十”及华侨博物馆等筹募经费。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他为社会主义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得到党的重视，党给予很高的荣誉和政治地位。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成立，被任命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过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和厦门市政协秘书长和付主席等职。为人谦虚诚恳、和蔼可亲。他患有高血压症。1960年8月19日从福州开会回来，由于劳累过度和过分兴奋，于当天晚上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三岁。

厦门港口航运及航海贸易概述

陈逢源

厦门，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座著名城市，素有“海上花园”之称。厦门四面环水，海岸曲折，拥有众多的天然良港，港阔，水深，终年不冻、不淤，万吨巨轮可畅通无阻，直泊内港。这里北距上海 560 浬（1 浬 = 1.852 公里），南离香港 287 浬，东到台湾只有 156 浬。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称：厦门港口“高居堂奥，雄视漳泉”，“为漳郡之咽喉”，“泉郡之名区”，“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海道四达，帆樯华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厦门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和华侨出入国境的重要门户。这些都促进了厦门港口的繁荣和航运业的发展。

一、厦门港口的兴起

厦门港口历史悠久，海上交通自古相当发达。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在唐朝，厦门就已有初具规模的码头了。北宋时期，在东渡正式设了“官渡”过渡到嵩屿，由五通过渡到同安、澳头、刘五店，由高崎过渡到集美，经峰道可分赴漳州、泉州和福州等地。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期，由于西方殖民者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影响了月港对外贸易和船只往来的正常进行。厦门港凭借港深、避风、出洋便利的有利条件取代漳州月港的地位，逐渐兴旺起来。1650年，郑成功夺取厦门，以此作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充分利用厦门港天然的优点以及传统的对外贸易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得这一时期的厦门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厦门设置“台湾兵备道”，

1684年设立海关，厦门港便成为合法的对外交通口岸和台运的主要基地。兴泉道移置厦门后，又增永春直隶州，称“兴泉永道”。清政府规定福建通洋船只必须在厦门和长乐五虎门停泊盘验，厦门遂成为福建省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到了1796年，厦门港一直是“远近贸易之都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

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航线扩展至古巴、美国、秘鲁、夏威夷、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厦门港虽也有一定程度发展，但主权丧尽，沦为外国殖民者掠夺中国的主要口岸之一。直至抗战胜利后，尤其是建国以来，厦门港才又得到了新生

二、航运业的兴衰

随着厦门港口的兴起，厦门的航运业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厦门的航运业起源很早。唐代已有帆船航行至我国北方口岸。公元1335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属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有商船千艘，常与泉州贸易，得“泉州外府”之称。1474年，泉州宣布闭港后，官商退出，私商活跃起来，漳州月港在私商活动中形成，泉州港口的贸易转往月港，厦门成为月港的门户，外洋船一般都要经盘验后从曾厝垵下水，然后分往东西洋。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厦，当时，约有30—40艘中国帆船往来于厦门至马尼拉之间。

郑成功取得厦门后，为扩展其军事实力，相当重视与海外通商，除派船出洋贸易外，还设立了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牙行”，并对这些商船、牙行的收支、利息进行查算。当时，每年从厦门一带前往日本、南洋各地的商船有七、八十艘，贸易额达二百五十万两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由郑氏“官商”经营的。